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 塔图姆 (James Tatum) ● 著

色诺芬的帝国虚构

——解读《居鲁士的教育》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张慕 罗勇 等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色诺芬的帝国虚构

——解读《居鲁士的教育》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美] 塔图姆 (James Tatum) ● 著

张慕 罗勇 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诺芬的帝国虚构:解读《居鲁士的教育》/(美)塔图姆著;张慕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经典与解释·色诺芬注疏集)

ISBN 978-7-5675-5150-3

I. ①色… II. ①塔… ②张… III. ①色诺芬(约前 431~前 355)—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7815 号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By James Tatum

Copyright © 1989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8-271 号

色诺芬注疏集

色诺芬的帝国虚构:解读《居鲁士的教育》

著 者 (美)塔图姆
译 者 张 慕 罗 勇 孙尧天
审读编辑 纪 盛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0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150-3/B·1013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古希腊伟大的著作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0)是苏格拉底的两位最善于通过写作从事文教的学生之一,传下的著作体裁多样、论题广泛:有史称西方自传体小说开山之作的《居鲁士上行记》、承续修昔底德笔法而修的史书《希腊志》、与柏拉图的《王制》争辩的长篇纪事作品《居鲁士的教育》、以苏格拉底为作品主角的“苏格拉底文学”四篇和若干主题广泛的短作(如《斯巴达政制》、《邦国资源》、《希耶罗王》、《阿格西劳斯》、《骑术》、《狩猎术》等等)。

自希腊化时期以来,色诺芬就已经无可争议地具有古希腊经典作家的地位,其著作因文笔质朴清新,从古罗马时代以来到近代,一直是西方古典文学的基础范本。锡德尼在说到历史上的纪事作家(希罗多德、李维)的笔法时,曾留给我们这样一句话:

色诺芬卓越地虚构了另一个这种计谋,它是由阿白拉达塔斯为居鲁士做的。我很愿意知道,如果你有机会用这样的正当欺蒙来为你的君王服务,你为什么不同样向色诺芬的虚构学习,偏偏要向别人的真实学习呢?事实上,向色诺芬学习还要好些,因为这样可以保住鼻子。(锡德尼,《为诗一辩》,钱

学熙译,人民文学版 1964,页 26)

自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以来,“形而上学”在西方文教制度中逐渐僭取了支配地位,色诺芬因不谈“形而上学”逐渐遭遇冷落,不再被看作地位很高的古希腊经典作家,取而代之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汉语文教界与西方文教制度接榫时,接手的是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跟着西方的形而上学后代对色诺芬视而不见。

在恢复古典的自由教育风气影响下,晚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整理、注疏、读解色诺芬著作又蔚然成风,成就可观。“色诺芬注疏集”志在成就汉译色诺芬著作全编,广采西方学界晚近成果,不拘形式(或采译疏体专著、或编译笺注体译本、或汇集各类义疏),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以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和我国文教事业的全新发展。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4 年 11 月

献给 Harry Avery 和 James Hitt

εὖ γὰρ μέμνημαι... [因我铭记着……]

除了在废弃的死语言的领域，尚无人在其个人经验中，讨论过教育的哪部分已经被证明是有用的，哪部分无用。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政府治理包含了规划政策的艺术以及运用政治技艺尽可能地获取这一政策所能获得的普遍支持：永远要去说服、引导、牺牲和教导，因为政治家最伟大的职责便是去教育。

罗斯福，1932年9月

尽管相较其他任何艺术，人们更有能力对表演（这一艺术形式）作出评断，但“真诚”的虚伪却阻碍人们去承认，他们自己也总是以自己的想象扮演着某些角色。

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

《露露在好莱坞》(*Lulu in Hollywood*)

前言

张慕译

[xiii]如果你探询小说的起源足够久远,追溯至笛福(Defoe)与小说在17世纪英国的兴起之前,甚至追溯至塞万提斯的古代老师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和阿普列乌斯(Apuleius)之前,那你迟早会到达公元前4世纪和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①那里被谈论的居鲁士(Cyrus)是居鲁士大帝(Gyrus the Great),那位在《以斯拉记》(Book of Ezra)中被颂扬为以色列解放者的波斯帝国的创立者。^②不说别的,居鲁士典范式的教育

① Hägg(1983),页108—24;Forcione(1972),页13—63;同上(1985),45;Perry,页169—74。参 Heiserman,页11—29。其中对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俄斯作为小说的先驱的谈论(但这一讨论没有提及 Rohde,页11—178)。另外,还有一份新近的研究主张《奥德赛》向后的和《伊利亚特》的联系远胜于它对后1世英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的先驱意义,参 Pucci,页13—30。

② Mallowan,页404和页412;参 Olmstead(1948),页34—58,以及在《以斯拉记》6.3—5(作者误作1.3—5)中被报告的公元前538年的声明:“居鲁士王元年,居鲁士曾为耶路撒冷天主的殿宇,颁发上谕:殿宇应予重建,为在那里举行祭献,奉献火祭;殿应高六十肘,宽六十肘,三层用方石,一层用木料修建;所有费用概出自王库。此外,凡拿步高王取耶路撒冷殿宇,而运到巴比伦的,天主殿宇的那些金银器、册都应归还,送回耶路撒冷的殿宇内,各放在原处,安置在天主的殿宇内。”犹太人视为上帝预言之实现(《耶利米书》25.11—14)的事情,对居鲁士而言却是出于政治权宜的行为。居鲁士的这一政治算计显示出,宽容是他在《居鲁士的教育》中所创造的虚构帝国的特征。

首先为后世的诗人和小说家提供了全亚细亚最美丽女人潘蒂娅(Panthea)的伤感爱情故事。^①而如果你完全是一个不同类型的读者,想要在马基雅维利之前找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时刻,你也迟早会追溯至同样的起源。^②因为《居鲁士的教育》同样是所有君主镜鉴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的声誉最后被《君主论》的出版所掩盖了。^③

这是一项关于色诺芬在同一文本中将虚构要素与政治要素编结在一起的研究。我的目标在于为当代读者复原居鲁士和他的教育,使《居鲁士的教育》成为某种 20 世纪的文本,而非仅是一项生僻的历史材料;去解释色诺芬是如何开始写作《居鲁士的教育》,如何将其整合在一起及其整体效果。但首先,我想理解同一部作品是如何可能在教导和启发政治哲人、君主和君主导师的同时,也教

① 一个经常中断的“中篇故事”(4. 6. 11—7. 3. 16);参 Trenkner, 页 26 和 Perry, 页 357, 注释 14。

② Mansfield(1985), 页 xxi。也参 Pocock(1975), 页 156—182; 参同上(1981), 页 61。

③ 我的目标不在于通过诉诸基本原则将《居鲁士的教育》重新定位为一部经过修改的经典,但我必须承认我从这一方法获益良多。Strauss(1948), 页 5, 是首位引起近来被称为色诺芬的经典性问题的学者:“对《希耶罗》(同样对《居鲁士的教育》)的忽视无疑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对色诺芬的智性力量那种流行的低估甚至轻视。直至 18 世纪末,色诺芬还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智者和明确的经典作家。在 19 和 20 世纪,色诺芬作为一个哲人被与柏拉图进行比较,继而被发现不足;作为一个史家被与修昔底德进行比较,继而也被发现不足。人们并不需要,但也许人们会与那些在比较中被预先假定的哲学和历史观点发生争论。需要提出的问题仅是,色诺芬自己是否首先想被理解为一个哲人或是史家。”与这一曾经盛行的标准相背离的一个重要例子是 Higgins(参 Higgins, 页 xiii);对这一扩大的理论问题的新近贡献,参 Fiedler, 页 145—245;Eagleton(1983), 页 194—217 和 页 229—331;Renza, 页 19—20;尤其是 James Cox, 页 129,“文学的师生和批评家已经越来越在事实的世界面前退却,而把它留给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而如果在写作的区块之中存在着太多的事实或理念,那么一切就会遭受放弃的威胁。看一看拉斯金、密尔、卡莱尔和纽曼已经如何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逐渐消失。小说拥有一切但却从当前的课程中溃败。”他所说的现象在美国古典学者有关文学的观念中有其明显的相似物。色诺芬不再被看作柏拉图、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意义上的文学作者。

导和启发诗人和小说家。它的影响范围[xiv]所及包括古代希腊小说家和斯宾塞(Edmund Spenser),同样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和伊丽莎白一世,以及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

要接近居鲁士和他的教育,首先必须承认接受理论在恢复经典文献中所能扮演的角色。^①正如色诺芬与我们之间任何一个其他时代的读者一样,我们所具有的我们自身的历史立场也必须得到承认。^②我们必须意识到,《居鲁士的教育》已按各种方式被阅读和重读,这些方式指向色诺芬所创造的难以捉摸的事实。这一事实无法被简化到原作中某个单一和决然的特点(卷一)。

由此,便不难宣称,存在着一种虚构小说与政治的混合,但这种混合同样是某种悖谬之物。在通俗说法中,小说意味着离开政治与现实而转向理想与非现实。小说允诺梦想的实现,愿望的满足,在小说的故事中,世界依照想象的方式运转,而非依照历史与实际经验。然而对色诺芬而言,将希腊的政治问题移置到异域的波斯王国之中的做法不但标明了一种创造政治权力本身的模式,而且还标明了一种创造潜在地教导政治权力的模式。^③色诺芬并没有从既有的文学中仿制出他的作品;他所从事的是一项创造性过程,这一过程开端于色诺芬对其他作品的回应,开端于他以全新的方式对古老问题的再思考。^④与先前的文学史研究者将《居鲁士的教育》置于边缘位置的倾向不同,这一关于虚构的政治功用的

① 也许因为现在很少有人阅读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的早期读者群是专家们的一个熟悉主题;参 Bizos, 页 lii—liv; Anderson(1974), 页 1—8; Lesky, 页 8—9 和页 695(《居鲁士的教育》的影响曾大于它的文学价值)。文本接受的理论用途则是另一个问题;参 Holub, 页 53—106 和 Jauss, 页 3—45;关于对接受理论的批评和它的限度,参 Wellek(1973)和 de Man, 页 xv—xxv。

② 对接受理论最好的批评来自 Stückerath; 尤其参页 116—27。

③ 参 Jauss, 页 92—94; Bakhtin(1981), 39; Jameson, 页 148—52; Mckeen, 页 151—52。

④ Bakhtin(1981), 页 28—31; 参 Lukacs(1983), 页 70—93; Eagleton(1976), 页 27—28; Brownlee, 页 1—21; Mckeen, 页 273 以下。

观念则将《居鲁士的教育》置于中心位置,正如色诺芬将它置于自身写作的中心位置。^① 将《居鲁士的教育》读作一部致力于政治事物的小说使得我们能够意识到它多重的决心与起源,^②正如它之后所经历的多重道路,它既可以成为诗人与小说家手中的玩物,又可以成为王室教育的垂范(卷二)。^③ 色诺芬在故事结尾所说的也同样意义重大。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创造了一部虚构小说之后,色诺芬转而成为它最早的批评者。本书将会以对色诺芬结束他的作品的方式的研究来结束自己(卷十)。

[xv]中间的章节(第三章至第九章)是关于如何阅读《居鲁士的教育》的论文。自始至终,研究的方法都沿着多重的交汇点前进,由此我们便可以在同一种阅读中兼顾政治与虚构。我在关注色诺芬所描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同时也会关注那些虚构的结构。居鲁士对权力的攫取是通过他与他人的遭遇被描绘的。居鲁士的教育绝非有静态的指规可循,而是理想的帝制与他现在和将来所遇到的对象之间的一种辩证置换。这些对象是他自己家族的成员,以及那些被他征服的邻国的民众。色诺芬的虚构手法主要由他对居鲁士所遇人物的虚构构成。如果说居鲁士是理想统治者的典范,那么这些人物本身便是专制帝国设计的典范目标。居鲁士总是获得胜利,而他们最后也总是服从。读者被鼓励去效法居鲁士,确有许多读者这样做了。但也有许多读者选择去效法色诺芬本身,宁愿追随色诺芬作为一个作者所设立的典范,而非追随色诺芬在关于居鲁士大帝的教育的记述中意欲使我们赞扬的典范。

① 参 Cohen, 页 266; Todorov(1976), 页 163; Jauss, 页 192; Mckee, 页 23—64; 尤参 Jameson, 页 135—36, “文学类型本质上是作者和他的读者之间的合同。”

② 这正是卷二的意义;序言(1.1)实际上创造了《居鲁士的教育》的诗性,时时引导我们如何开始阅读它。

③ 正如我应该主张,这与从色诺芬的著作中重构他的生平是不同的;对于那种方法,参 Delebecque(1957),各处,尤参页 6—22;亦参 Anderson(1974)。对此的批评,参 Higgins, 尤其页 xii—xiii; Hans R. Breitenbach, 页 1571—1578; Bizos, 页 xlvii—lii。

借由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赢得一个立点,通过它我们也许可以讯问我们所阅读的文本。而我们对《居鲁士的教育》提出的问题则必然是不同类型的。尝试将《居鲁士的教育》放置在一个单一类别中,你必然会发现存在着替代的类别选项:一部教育小说,一部历史小说,一部传奇传记,一部君主镜鉴,一部理想的传奇小说,一部小说之前的小说,抑或一项对希腊宪政理论(政制文献)的贡献。这些是现代读者会给予《居鲁士的教育》的归类;它们中没有一项是不准确的,而它们的总和则会比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一的方面都更接近事实。^① 阅读《居鲁士的教育》的一大乐趣正在于这一文本既符合又不符合其读者期待的方式。^② 而它持续打破那些本该带来真正类型的规则的方式则最为反讽。那些使历史学家感到挫败的东西正是最能使斯宾塞和卡里同(Chariton)那样的艺术家获得乐趣的东西。

为了成为《居鲁士的教育》的读者,[xvi]在接近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某种灵活性,某种批评方法类型的多样性,这一多样性是我们面对相似的文本如《仙后》(*Faerie Queene*)和《金驴记》(*Golden Ass*)时使用的。^③ 接下来会通过《居鲁士的教育》的接受状况的研究,它文本上某些细节要点的语文学分析以及它的叙述的跨文本和结构性描述来将它放置入当代文学理论和历史的语境。如果怀有同理心地进行阅读,几乎已被遗忘的语文学家如艾

① 见 Momigliano(1971),页 55—56; Hägg(1983),页 113,同上(1987),页 193; Bakhtin(1981),页 28—29; Perry,页 167; Hans R. Breitenbach,页 1707—1708。这一非常多样的类型学术语主张必须避免内在于类型学规范性观念的喜剧-肃剧、牧歌-历史陷阱。

② Barthes(1976),尽管 Barthes 的法国享乐主义妨碍了我们之中的清教徒——也妨碍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者表亲(参 Eagleton 1983,页 83)——他的享乐主义是一种西塞罗也会意识到的对文学的感受力;西塞罗在这一特定文本中感受到的乐趣由 Münscher,页 74—75 很好地记录了下来。

③ 新近的这一类型的典范性研究是 Winkler(1985)和 Goldberg(1981)。

克勒(Gustav Eichler)的著作(1880)对我们当下对《居鲁士的教育》的阅读的启发并不亚于理论家如巴赫金(M. M. Bakhtin)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并非对我自身古典训练的忠诚才使我说出这番话。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准备再次阅读《居鲁士的教育》,由“古典”这一术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探究的,因为作为一部古典经典,《居鲁士的教育》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了。

致 谢

张 慕 译

[xvii]本书最初是一项华盛顿特区希腊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原先被设想为一项对希腊小说的叙述技艺的研究,但很快便变形为与对《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的叙述技艺的研究截然不同的东西。成书拓宽的范围大大归功于中心前主任 Bernard Knox 以及我的同事 Fred Berthold。他看到达特茅茨人文课程的设立并给予我在其中开课的机会。

除了对我研究和写作的支持之外,达特茅茨学院还以多种方式支持了我的工作。我向巴克图书馆的 Patricia Carter、Virginia Close、John Crane 和 Sue Marcoulier 所给予我的工作的各阶段的殷切帮助致以谢意。在伦敦大学瓦尔堡图书馆的短暂时光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好客和受教。Gail Patten 是一位在原稿文字的处理和再处理上极为珍贵的合作者。来自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研究团队帮助我找到了完成这一研究的方法。

本书所呈现出的精炼也许首先要归功于那些在它尚处创作过程中便得知阅读其早先草稿的朋友所给予的耐心和批评。实际上我在那些早先的草稿中写下的一切都改变了。我还必须感谢全美 [xviii]语文学学会(旧金山)和新英格兰古典学会的年会听众;感